

## 试析

# 两汉少数民族人口 迁移及其影响

刘淑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生活在祖国各地。同汉族一样,少数民族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曾作出卓越的贡献,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两汉时期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历史状况,探讨中国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两汉(即东汉和西汉)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连的。

西汉经过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经济发展,国家逐渐富强。此时,汉武帝凭借较强盛的国力,先后进行了50余年的战争,在北方击败匈奴,在西方使西域36国臣服,在南方消灭了南越赵氏割据政权。鉴于经济及军事力量日渐强大,汉武帝多次迁匈奴于塞内。东汉时,统治者又将逃亡的南匈奴二万余人迁于安定、北地和颍川各郡。

东汉末年以后,由于中原战乱,人口大量逃亡,土地荒芜现象日益严重,北方一些民族被招引到内地,成为国家编户,还有一些民族的百姓入塞当兵。这类人口迁移现象自战国以来即已存在,但频繁而又大规模的迁移,则始于西汉时期,更确切地说,发端于汉武帝统治时期。此时少数民族中聚族而居的形式逐渐松弛,部分民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打破了民族隔离状况。

### 一

两汉时期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次数频繁,数量也多。那时居住在我国北方境内的民族除汉族外,主要有匈奴、东胡、林胡、楼

烦、乌孙及西域和东北各族。汉武帝在与匈奴进行的战争中,双方互有降虏。武帝对其中有地位的降虏,一般采取封侯的形式,将他们连同家属、随从安置在关东人口稠密地区,这些人的数量不多。自汉武帝以来,不少匈奴人归附汉朝,元狩二年秋(公元前123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sup>①</sup>该地区地阔人稀,汉族居民甚少,汉朝政将昆邪王降众安置在此地,以便直接控制。此后,有大批匈奴降人和俘虏被安置在五属国一带。这是《汉书》中有关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迁移的第一次详细记载。自此之后,匈奴降者陆续迁入。汉宣帝神爵二年秋(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宣帝五凤元年冬(前56年),匈奴呼遼累单于率众五万余来降,被安置于西河、北地属国<sup>②</sup>。匈奴是游牧民族,徙于属国后,基本生活条件并未改变,人口出生率不会增加,倘若“以平均年增长率2%左右计算,那末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内迁的匈奴人可能接近二十万。”<sup>③</sup>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自南匈奴归汉后,其部族入居塞内,分布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今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因与汉人杂居,他们逐渐吸收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加上生活环境安定,因此不少北匈奴

① 《汉书》卷6《武帝纪》。

② 《汉书》卷8《宣帝纪》。

③ 葛剑雄:《两汉人口地理》176页,人民出版社。

入纷纷南下归汉。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时,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余人来降。汉章帝时,北匈奴三木楼耆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北庭大乱时,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士兵八千人投奔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汉和帝时,派兵出朔方进攻北匈奴,俘获二十余万人。仅在七八年内,北匈奴竟有40多万人,内迁数量确实可观。

在西部和西北地区的羌人,两汉时期主要生活在今黄河、洮河以西及河西走廊以南的甘肃省和青海省等地。汉武帝时曾派兵征西羌<sup>①</sup>,持续数年。羌人因此大量减少,投降和归附者约三四万人。汉朝政设置金城(今甘肃省)将羌人安置于此。

在中国南部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交通闭塞,迁移较少。东汉时期由于战乱,部分汉族百姓陆续迁入,另有部分少数民族内附。据史书记载:汉明帝时(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附,有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汉显宗在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sup>②</sup>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sup>③</sup>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先后约有六万人内附,元初三年(116年)又有“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sup>④</sup>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sup>⑤</sup>

## 二

两汉时期少数民族迁移规模大、范围广,发展过程也是逐步兴起的。就是说,人口迁移是随着汉朝实力增强而不断发展的。这也是两汉时期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一个特点。

汉初,长期的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部分少数民族统治者不断乘虚而

入,骚扰边境。在这种情况下,汉政府以安定为上策,大力发展农业,鼓励人口增殖,甚至对匈奴侵扰边疆不予反击,用和亲政策求得边境的暂时安宁。这一阶段少数民族迁移不仅次数少而且规模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力量与日俱增。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反击,匈奴皆以失败告终。此后,匈奴不少人口陆续内迁归附于汉。匈奴力量削弱,因而也无暇顾及周围少数民族,所以当年深受匈奴奴役和侵略的弱小民族也摆脱束缚纷纷投奔汉朝。甚至原被匈奴征服、被迫迁往左地的西羌族数千人,公元前68年也乘机反击匈奴,举族投归汉朝。那时匈奴有数十万落户“赏虏”(奴婢),利用匈奴分裂时机,从漠北集体逃亡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继续过着“畜牧逐水草”的生活,<sup>⑥</sup>这些“赏虏”包括大胡、丁零和羌族的百姓。

从史书记载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内迁归汉,大部分是在汉武帝及以后的年代,这是由汉武帝统治日趋巩固,国内安定,军事力量不断强大所致。当然汉朝作为一个大国对周围各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也随之达到高潮,每次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迁移对象也由匈奴扩展到氏、羌、乌桓、东胡等族。

从少数民族内迁流向范围来看,虽然存在着人口“向心”迁移倾向,但迁移地点主要在边远地区。这是两汉时期少数民族迁移的第二个特点。

两汉少数民族迁移十分活跃,其主要倾向是向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作“向心”迁移,但由于汉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少数民族,将他们从居住十分分散的广大地区,逐

① 《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

②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④⑤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⑥ 《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步安置在边区郡县,极少部分安排在关东及关中落户。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率四万人降汉,汉朝政府将其安置在五属国一带<sup>①</sup>。属国治所周围土地空阔,汉族居民很少,匈奴人在此地保留其故俗,仍以牧为主。五凤二年“匈奴呼遼累单于帅众五万余降。”汉朝政府也将这批人安置在五属国的西河和北地。东汉时期,汉朝政府将入内降汉的匈奴人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将鲜卑、乌桓等族安排在辽西、辽东、上谷和渔阳一带的边远郡县,南方归汉的则安排在人口稀少的“江淮之间”和两广地区。

当然,也有一些安排在人口稠密的关东和关中地区。这部分人数量极少。《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这里所指的越骑就是内附的越人,胡骑则是来自西北的胡人,汉朝政府将他们作为保卫京都的精兵,长期居住关中。还有一部分归汉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官员及其子孙,也被安置在关东,甚至永居长安等大城市。

### 三

少数民族的迁移方式有以下几种几类:自发性迁移、半自愿的举族性内移、强制性迁移,表现为突发性和大流向的人口流动特征。

两汉时期少数民族迁移多是人数众多的内迁。有的民族内部矛盾激烈,互相厮杀。为了逃避内乱求得和平的生活环境,他们在某些族长带领下投降归汉,往往是几千或几万人投奔一处,形成了大流向的人口流动。如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为了得到强有力的靠山,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率领下举族投降归汉,极大地削弱了北匈奴的力量,竟促使北匈奴大量百姓迁移,投奔南匈奴和汉朝。

汉武帝时,汉朝出兵镇压羌人,迫使数万羌人西迁,也有部分羌人投诚被安置在

汉统辖地区。汉初,氏人大部分居住在武都郡,即陕、甘二省与四川交界处。武帝时将大量氏人移居西北,“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sup>②</sup>由于统治者将大批羌、氏族百姓强制迁往西北诸地,致使该地区少数民族出现大流向的人口迁移。江淮地区地势平坦,适宜开垦,又能安置较多的人口,因此,武帝采取弃地徙民的方针,将大量越人强制迁往“江淮之间”落户。

少数民族举族内迁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汉族聚居区农业发展、经济繁荣却象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少数民族。那时,汉朝铸铁技术先进。而法律却又规定严禁兵器、铁器、铜器输出边境,违者以死刑处之。因此许多非汉族的农业部落请求内附,自愿改为汉郡县,铁器贸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两汉少数民族人口迁移从当时和长远看,都起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冲破了民族界线,打破了民族隔绝状态,改变了部分民族地区的社会性质。由于各种方式的迁移,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的局面,有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也有以汉族为主。尽管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及文化发展情况不尽相同,但他们迁移后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受迁入地区的影响,因而逐渐扎根落户融为一体,从而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汉族较高文化帮助了少数民族逐渐脱离愚昧落后面貌。尤其铁器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一些汉族地主官吏和商人,凭借本身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有意和无意地按内地生产方式改变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使之迅速发展,并逐步改变了这些地区社会的性质。有的由奴隶社会甚至由原始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如汉政权在海南岛设置郡县后,许多商人、士兵、官吏和百

<sup>①</sup> 五属国治所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171页。

姓迁到岛上居住。<sup>①</sup>他们和黎族百姓共同生活,使该岛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因素迅速增长。

其次,两汉少数民族的迁移大大加速了民族间的互相同化或融合的进程。秦汉以来各民族的迁移改变了特定地区民族的单一性。例如西汉时期部分匈奴、氐、羌等族迁入陇右、关中一带长期与汉族共处,不可避免地接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最后加入汉族,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带领大批南匈奴百姓归汉,公元48年比单于率南匈奴投奔东汉。这些百姓居住在五原、北地、雁门一带,与汉族杂居,以致大部分同化于汉族和鲜卑族中。这样互相不断融合,使我国各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流多源关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汉族百姓与其它民族融合而演变成新的民族。据史书记载:“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立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sup>②</sup>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故或名之为秦韩。”<sup>③</sup>当时鲜卑族的兴旺,也是“汉人遁逃,为之谋主”<sup>④</sup>的结果。所以在两汉时期,有些民族在同化过程中消失了,也有些民族不断壮大。其中不少民族在汉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下,人口明显增加。同时,这以后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汉族人民也不断地向东北、西北及长江、珠江一带少数民族地区迁移,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同化的发展时期。

两汉时期各民族同化的过程也为增进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彼此相互影响创造了条件。列宁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sup>⑤</sup>两汉时期,北方一些民族内迁后,由于他们迁

移后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又受到迁入地区的影响,从而推动了本民族经济的发展。

《后汉书》卷85记载挹娄族百姓“有五谷麻布”、“其俗好养猪”、“无牛羊、多畜猪”的生活习俗都深受汉族影响。还有的民族如匈奴族、羌族等由于迁移,使之由以游牧为主转向农业定居,并逐步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同时中原地区的较高文化帮助少数民族逐渐脱离社会经济的落后状态,尤其是汉族使用的铁器及生活用品不断传入边远民族地区,对提高当地的生产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定居生活能使人们免遭风餐露宿冻馁之苦,从而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孕妇、婴儿的死亡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明显地提高了少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的少数民族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在婚姻方面不再乱婚或近亲结婚。如洿族规定“同姓不婚”<sup>⑥</sup>,羌族则“十二世后,相与婚姻”<sup>⑦</sup>这对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起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人口增长。鲜卑族在西汉时人口只有20万,从东汉中期不少鲜卑人迁入匈奴故地和内地,由于受中原社会经济和风俗的影响,逐步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化,人口也不断增加,到了东汉后期,鲜卑人口已增至60多万。

总之,两汉时期少数民族人口的迁移流动和各族间的相互接触,造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并加速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自然同化。

(本文责任编辑: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

①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424页。

②③④ 《后汉书》卷85。

⑤ 《列宁全集》19卷,第504页。

⑥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⑦ 《后汉书》卷87《西羌传》。